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

走近侯仁之

——恭贺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

學苑出版社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编

走近侯仁之

——恭贺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近侯仁之：恭贺侯仁之先生百岁寿辰 / 北京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077-3913-8

I. ①走… II. ①北… III. ①侯仁之—纪念文集
IV. ① K825.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371 号

责任编辑：杨 雷

装帧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f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印 刷 厂：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尺寸：740×1050 1/16

印 张：26.25

字 数：42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5.00 元





1926年



1938年在研究生宿舍



1939年与张玮瑛



1947年在利物浦大学宿舍



1948年在利物浦大学宿舍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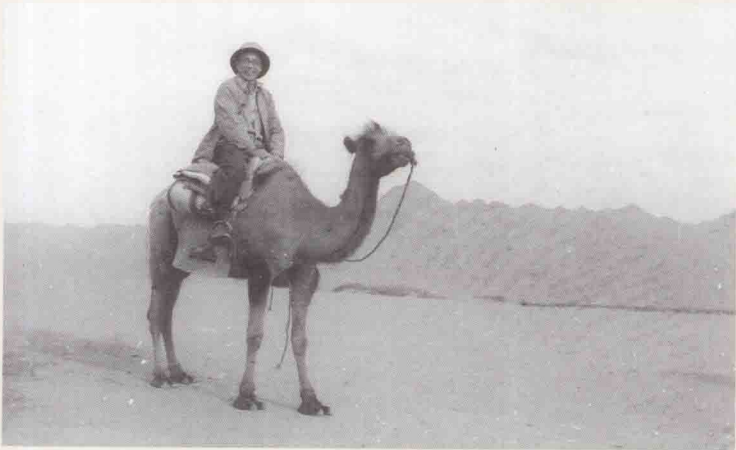
1948年与曹天钦在剑桥



1955 年校运动会上



1956 年指导学生科研小组



1961 年沙漠考察



1962年



20世纪70年代做学术报告



1985年与博文中学校友



1986 年看望冰心



1988 年在海南考察



1995 年与徐兆奎



1996 年与陈述彭



1998 年 87 岁生日扫雪



2001年90岁在办公楼前

天光云影共徘徊（代序）

张玮瑛

和仁之相识是在 75 年前的 1932 年。我于 1931 年先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仁之晚我一年入学。我们在洪业（煨莲）教授讲授“史学方法”的课上相识。那间课室位于适楼（后改名为俄文楼）一楼的西南角，我们坐前后排。共同的课业和志趣使我们逐渐接近。课余我们有时在适楼南门外会面，而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图书馆。从图书馆出来，仁之总是先送我回到女生二院，再返回未名湖北岸的男生宿舍。

从 1932 年作为新生踏进燕京大学校门起，仁之在学贯中西的洪业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启发下，一步步进入学业研究领域。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也深深地影响着仁之的学业探索。1932 年顾颉刚教授开设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这门课，探讨历代疆域和政区的演变，后又发起成立以研究古代地理沿革为中心的《禹贡》学会，设在位于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 3 号寓所。仁之在这里参加过《禹贡》的活动，聆听过顾先生的教诲。学会的同名刊物《禹贡》半月刊也于 1934 年 3 月出版，成为交流学习心得和信息的学术园地。仁之学生时期在《禹贡》上先后发表过十余篇文章。

1935 年长江中下游大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他深受震撼，写了《记本年湘鄂赣皖四省水灾》一文。由此，他开始关注历史上水利的兴修，阅读水利史的典籍。他的学士论文便是关于清代黄河的治理，题目选为《靳

辅治河始末》。在写作过程中，他注意到辅佐靳辅治河的陈潢起了重要作用，却被诬陷入狱、迫害致死。洪业教授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便要仁之以《陈潢治河》为题，着文宣扬为民除害、以身殉职的陈潢，并将这篇文章刊登在他自己参加主编的《大公报·史地周刊》上。洪业教授对燕京大学校园新址的研究也使仁之深受启发，引导他日后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实地考察，进而扩及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仁之在燕京大学不仅有幸聆听洪业教授和顾颉刚教授传业授徒，亲炙教益，而且有幸目睹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洪业教授和顾颉刚教授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坚守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形成的行为准则。这为他日后学业和持身律己立下了根基。我师“育我之亲，爱我之切”，仁之对此是感念不忘的。

仁之的胞弟侯硕之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他们兄弟二人自幼同生共长、手足情深，那几年间更是交往密切，我也时有陪仁之去清华看硕之。硕之的课余倾心译述和科普读物写作。上海开明书店于1935年出版了他翻译的《宇宙之大》，是仁之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替硕之誊清的。

仁之的本科毕业后的暑假，参加了《禹贡》学会组织的“黄河后套水利调查”。这第一次大规模野外考察，影响到他日后对水源水系研究的重视。留校后，仁之担任顾颉刚教授的助教，协助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班”，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每隔一周的周六下午，都要带学生到事先选定的古遗迹或古建筑所在地（或在北京城内，或在城外近郊）进行实地考察。仁之根据参考资料，写出简要的介绍文章，铅印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考察的参考。我每次参加，收益良多。这项工作使仁之进一步认识到野外实地考察的重要。他多次徒步跋涉，跑遍了北京大半个郊野，尝试将文献的考证和野外考察结合起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而北平沦陷。顾颉刚教授为躲避日寇追捕，被迫离校出走。仁之转为洪业教授的研究生。爱才惜才的洪业教授注意到仁之的学术思想开始向研究历史时期地理学的方向发展，便着手为他安排去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的计划，后因欧战阻隔，未能按



2001年侯仁之与张玮瑛夫妇在寓所门前

时成行。

1939年8月，我们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东厢结婚。国难当头，婚事不张扬，仪式从简，只备便宴。司徒雷登校长是证婚人，我们的老师洪业教授、李荣芳教授及他们的夫人在座。就这样，从20岁时的同窗，到现在90多岁的老伴，我和仁之相随相伴，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

1940年7月，仁之在洪业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续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之部》，获燕京大学硕士学位，继续留校任教。华北沦陷后，为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同时秘密协助爱国学生离校前往解放区和大后方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司徒雷登校长任命仁之兼任“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以协助委员会主席、美籍教授夏仁德(R. C. Sailer)。辅导委员会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1941年12月7日，日寇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立即被封。师生20余人，包括校长司徒雷登、陆志韦教授、赵紫宸教授、洪业教授等先后遭到逮捕。刚刚度过30岁生日的仁之，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戴拷押解至北平入狱。11名燕京大学教员在狱中表现了坚贞的民族气节，仁之是他们中最年轻的。

1942年6月18日，仁之被日寇军事法庭审讯，以“以心传心、抗日反日”的“罪名”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无迁居旅行自由。仁之只得随我寓居天津我父母家。出狱后五个多月，侯硕之从四川徒步北上到陕西凤翔时遇害的噩耗传来。仁之日不能食，夜不能眠，悲痛欲绝，不能自己。幸得洪业师关怀，启发他继承硕之科普写作的志向，才使仁之重获生活勇气。次年，老父饿死于故乡，仁之悲愤满腔，却因无行动自由不能奔丧。为了摆脱日伪不断上门纠缠，仁之先后到达仁商学院、天津工商学院任教，继续写作因被捕入狱而中断的专题论文《北平金水河考》，并对天津聚落的起源做进一步研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作为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委员五成员之一，仁之立即回校接管燕园，清查校产，筹划复校。56天后燕京大学复学。1946年8月，按照七年前洪业教授已为他制定的计划，仁

之负笈远行，乘船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就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当年书信往来走海运，总要两三周的时间，真是家书抵万金。仁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描述他第一年的紧张生活：“我现在每周换三个人：第一个‘我’，是大学一年级的 fresher，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到学校读书上课，做制图实习；第二个‘我’，是研究院的‘博士待位生’，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与晚间，在宿舍做个人的研究工作；第三个‘我’，是《益世报》的驻英通讯员，星期六读一周报纸杂志和做参考笔记，星期日用整天写通讯。”仁之以充沛的精力，在三重身份中转换。随着课业的深入，达比教授的学术理论及其对当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实践，使仁之愈益受到启迪，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新境界。倾注三年心血，对数年来孤立的专题研究积累的有如“砖头瓦片”般的资料重新加以组织、审视、提升，终于在1949年夏完成了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

获得博士学位后，达比教授希望他多留一年，继续在该校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同时研究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分布。但是仁之归心似箭，赶在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三天，回到了北京，并立即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祖国的文教事业中。1950年7月，他发表了回国后的第一篇文章《“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当时仁之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地理学，又应梁思成教授之邀在清华大学讲授《市镇地理基础》课程，兼任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由梁思成教授推荐，1951年4月，政务院任命仁之为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这使仁之得以立即展开首都都市计划中西北郊新定文化教育区的地理条件和发展过程的实地考察，提交了《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论文。此时，仁之产生了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的设想，并得到梁思成的鼓励和支持。1951年5月，梁思成教授亲自给中国科学院写信，申请为仁之配置一名专职绘图员，以协助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两三年间，是仁之一生中最留恋的“学以致用”的时期。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消，北京大学迁入燕园。仁之任教于北

据这个计划，1963年夏再赴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1964年夏再赴陕西榆林地区及毛乌素沙漠。那几年正处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在北京，粮食油糖定量，进西北荒漠条件更是艰苦。仁之凭着自己身体底子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始终斗志不减。一次乘坐的吉普车出事故翻进沟里，插在胸前口袋里的两支钢笔都折断了，他万幸没有受伤。白天冒酷暑出没沙丘，晚上和住地的老乡交谈。在旅途上随手写下的《沙行小记》及《沙行续记》是那一段经历的生动纪录，充满了乐观与豪情。平日烟酒不沾的仁之，为了表示对当地习俗和地方领导的尊重，还在主桌席上敬酒回酒，直到主人和宾客一个个醉倒被搀扶而去，他还能应付自如——这还是最近我从当年随他进沙漠的学生那里听到的。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仁之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批斗，抄家，关押，遭受到人身迫害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我也受到牵连。1969年仁之从“牛棚”出来，又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劳动两年，我随社会科学院去了河南干校，孩子们在北京。那三四年的时间里，全靠写信寄包裹传达互相的惦念，每封信都是在三地之间转一圈传阅。仁之很惦记我下到干校后出现的心绞痛毛病。直到1973年我从河南息县回来，我们才得以团聚。那时的我们，已经是60岁的人了。

从江西回来后，仁之继续受监管在校内劳动，不过多少可以有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了，他迫不及待地拾起中断的研究。”文革”后期，“四人帮”的政治蓄谋加紧实施，四处发展势力网罗人才，学校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幸免。1974年6月，仁之突然接到通知，紧急集合上火车，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下车后才知道是到了江青树立的典型——天津小靳庄。几天后返校又被召去开“座谈会”。仁之警觉到情况不好，想走。我们对于江青在“文革”中历次来北大的所做所为，非常反感。每每议论，以“三点水”代其名。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不愿从命，然而，脱身不易。仁之进城去看我们信赖和尊敬的老朋友翁独健。独健先生已从旁知道仁之被点名去了小靳庄，对他说了一句话：“三十六计，走为上！”正好这时邯郸在战备“深